

日本江户时代道家思想传播之考察

王 晚 霞

(湖南科技学院 中文系,湖南 永州 425199)

[摘 要] 宋学在镰仓时代前期传入日本后,经过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研习,到日本江户时代逐渐成为主导学术思潮,在此期间,道家思想也成为儒学崛起的利用工具之一,而得到发展的契机,遂至以林希逸《老子庸斋口义》《列子庸斋口义》《庄子庸斋口义》为代表的道家文献在江户时代广泛传播,成为日本学人研读老列庄的首选注本。此时期道家思想之生发,既是佛教衰微和儒学崛起的矛盾提供了契机,更是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学术思潮中,日本学术、社会发展自律的结果,也有诠释学、文献传播学、心理学方面的原因。江户学者对道家思想多抱持为我所用的态度,道家思想虽始终未取得主导地位,但思想被儒释二教选择性受容,滋养推动了日本新思想的诞生。

[关键词] 日本江户时代;道家;林希逸;老子;庄子

[中图分类号] K313.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8)05-0095-05

日本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动乱频仍,尤其是镰仓时代后南北分裂,约六十年间天皇、幕府将军、守护大名及武士团内部互相斗争激烈,过去从属地位的小农获得了独立的机会,促进了农业及其他各种产业的发展,农业产品和手工产品的交换随之盛行起来,商业经济也得到发展,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平民势力开始出现。室町时期,许多大名各自割据,之后历经战国和织丰时代,纷争持续一个多世纪,丰臣秀吉死后,最有实力的大名德川家康获得实权,在庆长八年(1603)被任为征夷大将军,开创了江户幕府,直到庆应三年(1867)大政归还给天皇,象征着江户时代的终结,共计265年,因幕府设在江户(今京都)而称名江户时代,因政权始终被德川家族掌控,也称德川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朝末期到清朝末期。

思想发展史上,奈良和平安时代,佛教是日本的国教,在社会上具有主体地位,到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随着中国儒学的传入,儒佛交织并开始互相走向对立面。室町时代京都和镰仓实行五山制度,以五山禅僧为主要创作者的汉文学与文化在日本流行起来。五山文化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色彩,由于此时官方对禅僧开放海禁,通过两国佛教界的互通往来,禅僧成为日本接受、创作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主体,五山禅僧们主导的是佛教,但他们多数并不完全排斥

中国儒学和其他中国的传统思想,比如道家思想。禅僧们以开放想心态研究各类汉籍,道家文献也在其列。江户时代相对政治稳定,基本上是太平盛世,社会经济和商业得到大力发展,蓬勃崛起的商业经济大大动摇了武士阶层赖以生存的经济利益,而多年寄生于武士阶层的僧侣之地位自然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与维护稳定的政治统治相适应的是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儒学成为学术主流。在这样思潮转换的时代中,道家经典文献也便趁机在日本传播开来。

一 在日本江户时代传播的道家思想文献

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大致有三次密集时期,在日本流行的中国文化及汉文学也相应的有三个高峰,“其一为奈良朝缙绅贵族的文学,其二为室町时代五山禅宗僧侣的汉文学,其三为江户时代儒者文人的汉文学”^[1]。早在平安时代,已有道家文献在日本流传,13世纪以后,禅僧先后入宋带回一些道家书籍并展开研究,16世纪以后到江户时代前期,曾不被承认的老庄之学经过上古和中古文化的积淀,得到空前发展,“道家思想在江户时代日本的思想文化领域已有相当广泛的传播”^[2],掀起了研读老列庄注本的潮流。

道家经典文献在日本的传播,既是日本学术思想自律发展的产物,作为日本进入更高文明阶段的标志,也是日本社会政治发展他律的结果。因为

[收稿日期] 2018-08-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亚濂溪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资助(编号:17BZX070)

[作者简介] 王晚霞(1977-),女,陕西周至人,湖南科技学院副编审,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在古代东亚世界,受容中国书籍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3]。日本江户时代建立的佐伯文库就收藏了一部《道藏》,道家思想的经典文献以老列庄为主,各个注本的流行程度各异,日本“现存最古老的《老》《庄》写本,是奈良圣语藏的河上公注《老子》下卷和高山寺藏郭象注《庄子》残卷,都书写于镰仓时代,可知自平安朝至镰仓时代,广泛流传的是《老子》河上公注和《庄子》郭象注”^[4],当今的日本学者也认为自古以来,日本人读《庄子》就采用郭象注^[5]。这种情况到 14 世纪末才有所改变,五山禅僧们在开始采用林希逸的口义本来读《庄子》,《老子》,室町时期的《老子河上公注》抄写本,就多次引用林希逸的《老子虞斋口义》,这是日本独有的。到 16 世纪以后,整个江户时代最流行的老列庄注本便是林希逸的《老子虞斋口义》《列子虞斋口义》《庄子虞斋口义》,并成为江户前期学者接触老列庄的首选注本^[6],一时风头无两。

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7]中记载了日本自古到 1973 年所有的老庄注本,其中最早的《老子》注本在 1550 年,共记载有 311 种,最早的《庄子》注本在 1530 年,共记载有 169 种。记载的从室町末期到江户末期的《老子》注本有 158 种,其中有关林希逸《老子口义》的是 16 种,记载的《庄子》注本共有 77 种,有关林希逸《庄子口义》的是 11 种。严灵峰统计的数目应该比实际的少。据笔者研究,《老子虞斋口义》在日本的刊本至少有 23 种版本,其中 18 种都刊刻于江户时代,《庄子虞斋口义》在日本的刊本至少有 21 种,还有多种注本在注释中采纳引用林希逸口义本。根据日本庆应大学斯道文库编的《江户时代书林出版书籍目录集成》^[8]记载,仅有关《庄子》的注本之出版就有 75 种,另考察《庆长以来诸家著述目录》^[9]、《汉学者传记及著述集览》^[10]、《国书总目录》^[11]等,以补严灵峰书目之不足,总计江户时代研究《庄子》的书目有近 90 种之多,足见江户时期日本人对老庄学说的受容。

文献传播有一定规律,一般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文本阐释活动,它是文献社会传播的基础和实现目标;另一方面是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渠道完成的文献传播活动。”^{[12]86}文献传播与思想的传播,是一体两面、互相依附、相辅相成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江户时代的老列庄有多种阐释文本,在诠释方式上呈现出多种样态,有训点本、俚谚抄本、通俗注解本、插图本、头书本等,在传播文本的文字类型上,有汉文、日文,在版本形式上有木刻本、铜板印刷本、手抄本等。正是因为道家思想在江户时代的流传渐

广,才产生了对道家经典文献的多种需求,从而催生了多种形式的版本,同时,多种版本又承载、推动着道家思想的传播。

二 林希逸《三子口义》之流行

道家思想在江户前期社会思潮中所处的地位,有学者认为林罗山引以为自己学说基础的神道教,在大部分的德川时代处在一个支配性的位置:“罗山看作是他的理论基础的神道,即吉田神道,在大部分的德川时代处于一个支配性的地位,这毫不惊奇。”^[13]而中国的道教在日本镰仓到室町时期,“虽然被日益崛起的武士道所排斥,但它的一些教义和道术却被神道教所吸收,潜在地进入了具有纯粹日本特性的神道教”^{[14]483-484},所以德川时代神道教的地位部分意味着道教的地位,因而道教的基础性地位也就意味着道家思想的为人所重,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林希逸的《老子虞斋口义》《列子虞斋口义》《庄子虞斋口义》的流行。

林希逸(1193—1271)^[15],字肃翁,又字渊翁,号竹溪,又号虞斋、献机,晚年自号溪干,今福建福清人,官至中书舍人,《福清县志》^[16]、《淳熙三山志》^[17]、《福州府志》^[18]、《八闽通志》^[19]对他的生平有简要介绍。他用当时的口语、杂语、俗语作注的《老子虞斋口义》、《列子虞斋口义》、《庄子虞斋口义》传入日本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五山时代,由禅僧开始以林注为底本而在日本讲解传播开来,台湾学者王迪认为《庄子口义》至迟在南北朝期间,也就是 1392 年就已为人所知^[20],到江户初期,大儒藤原惺窝点校《列子虞斋口义》,其高足林罗山手抄、批点、训点的《老子口义》就有 6 种刊本,林罗山“板刻林希逸《庄子口义》,开启日本江户期研究《庄子》之端绪”,因而林希逸的“老庄著作在日本风靡一时”^{[14]472},据笔者研究,林注三子口义在日本的相关版本至少有 55 种^[21]。

到南宋时期,注解老列庄的著述不胜枚举,林希逸注本刊行后,并未在中国引起广泛赞誉,影响力也较有限。其时,王弼本、河上公注本、成玄英本、郭象本,被公认为是诠释精当、文辞典雅、观点新颖的经典注本,而这些注本在东传以后,在长达 265 年的日本江户时代,竟然都没有受到重视,反而是不被中国学界看好的林希逸注本,受到日本知识人的追捧,在日本江户时代独占鳌头。日本学者对三子口义多有评价,如林罗山认为“希逸视诸家最为优”^[22],渡边操认为“今世人读《老子》者,多赖林虞斋口义”^[23],山本洞云在其《老子经谚解》序中云“《口义》比之诸

家颇为优也”,元禄十五年(1702)年发行的《倭版书籍考》“诸子百家之部”中在《老子》下只记载了《老子虞斋口义》,并注解云“《老子》诸注之内无能胜于《口义》之注解”,而且在《列子》下也只记载了《列子虞斋口义》一种,可见日本学人对林注的评价高度及受欢迎程度。

三 江户时代对道家思想的受容

(一) 江户学者与道家思想

从镰仓到室町时代,著名学者对道家思想皆有所及。室町时期的第一流学者、皇室讲官清原宣贤(1475—1550)依据林希逸口义本来讲述《庄子》,其讲述后被他的孙子清原国贤于天正八年(1580)整理抄写成《庄子抄》。中世纪禅林多有禅僧涉猎老庄学,芳贺幸四郎认为有39人,王迪认为有47人^[20],综合孙亦平、张谷、王迪、池田知久等学者的研究,“当时根据新注《庄子虞斋口义》来研究《庄子》的禅僧有惟肖得岩、一华建恁、万里集九、天隐龙泽、伯容见雍、月舟寿桂、莫甫永雄等7人”^[24],这些人对林希逸口义本的研究和关注,为江户时代道家思想更为广泛的流行,奠定了基础。因为“禅僧对后世的影响也不仅限于佛教、儒学,其对老庄研究的影响也一直持续到江户时期。”^[20]禅僧对老庄思想的研究和吸收,是道家思想传播的基础之一,因为“没有阐释的传播是毫无意义的徒劳之举”^{[12]86},无法被真正吸收和化用,道家文献从镰仓到江户时代,都有诸多阐释文本。前期大儒林罗山对林希逸口义本极为重视,有1627年《老子虞斋口义批点》,1652年《道春老子经抄》,1657年《道春首书老子经》,1669年《老子抄》,1657《鳌头庄子口义》等六种不同刊本,他的老师藤原惺窝也有日本万治二年(1659)《列子虞斋口义点校》四卷。其他学者如松尾芭蕉、良宽、贺茂真渊、近藤万丈、三浦梅园、安藤昌益和广濑淡窗等,不仅深入地研习老庄思想,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将老庄思想体现出来^{[14]536},其中安藤昌益(1703—1762)和广濑淡窗(1782—1856)是江户中期日本老庄学两大家,广濑淡窗以儒者立身,著有《老子摘解》等道家著述。这些都体现了学者对道家思想的受容,同时也促进了道家思想的传播。

(二) 学术思潮与道家思想

在学术思潮上,江户时代最显著的变化是儒学的崛起。宋学在镰仓时代前期传入日本,经过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研习和传播,已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和文献传播基础,到江户前期,经过藤原惺窝和林罗山的研究推广和幕府将军的支持,在佛学日益颓败

的时机中,逐渐上升为主导社会思潮,最终的江户中期经过宽政改革后被立为官学。在江户时代流行的儒学与镰仓室町时代不同,与中国也不同,因为其中融入了在日本流行的神道教的思想。儒学抓住在日本已有深厚社会基础的神道教思想进行传播的同时,神道教也吸收了儒学的思想,“不用说,神道教制造了有效的故弄玄虚的策略,但是新儒学提供了另外一种原因,最适合这种情形:从原理上组织论点。神道教已经实行了很多新儒学的原理在其结构中,主要是通过有神道的神秘性和新儒学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价值之间创建平衡。”^[25]同时,神道教也吸收了中国道教的思想。由此可见江户时代学术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儒释道三教融合。

主要是儒释道三教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其实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在日本中世纪就出现了,室町时期五山文化中的特点之一便是儒释道不分,禅僧们研习中国典籍与文化,领域上覆盖儒释道三家,禅僧们是较早实践三教合一的人群。黄檗宗开山祖师隐元隆琦的高足即非如一禅师,也是林希逸的后裔,在江户前期赴日后,整理了林希逸的《老子虞斋口义》,作为一个释者,即非禅师对道家经典的整理,体现了江户前期禅僧在思想上儒释道并用、释外儒道内的三教融合思潮。经过镰仓到室町时代五山禅僧对汉学的研究和传播,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宋学渐渐在日本发展起来,到江户时代初期,以藤原惺窝和林罗山为代表的禅僧,其外佛内儒道的身份和思想特点,正是对五山禅僧三教融合观的继承,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下,同样持三教融合观的林希逸注三子口义,才便有机会迅速在日本传播开来。日本学者也注意到了在室町到江户时期社会思潮的三教合一的倾向^[26],包括林希逸三子口义中体现出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27-28]。而仅仅有这种思想基础,还远不足以成为以口义本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日本流行的条件,日本社会本身还需要有接受和发展这种思想的条件和土壤,才能够双方在遥相呼应的前提下深入结合,日本学人对道家思想的受容过程,伴随着对以三子口义为代表的老列庄文本的诠释过程。

诠释学较早是在西方兴起,认为思想被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也是思想被诠释和理解的过程。西方诠释学谈的更多是理解,这种理解侧重于对文本语言的表面理解。而古代东亚士人多是述而不作,对古人著作在新时代下阐发个人思想,这种阐发显然与诠释学差别较大,但并非与西方诠释学毫无关联,与伽达默尔提出的“效果历史”有些类似,因为“效果历史意识具有对传统的开放性”^{[29]510},也就是可以

将传统和解释包容为经典思想的某个向度。解释的过程当然要依靠语言,“一切理解都是解释,而一切解释都是通过语言媒介而进行的,这种语言媒介既要把对象表述出来,同时又是解释者自己的语言”^[29]⁵⁴⁷。口义本在日本的被理解和解释时用的语言,正是日本人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是日本人自己的表达方式,这种“理解的语言性是效果历史意识的具体化”^[29]⁵⁴⁷。三子口义中体现出来的三教思想并存的语言,就成为日本人理解口义本的首要依靠。江户前期日本社会中儒释道共存的现状,就成为这种理解得以展开的思想基础。

当然,一个事物的流行绝非由于某一个或几个单一的原因,正如 Derek Thompson 引用忽必烈和马可波罗的话说:“忽必烈询问是否是一个石头支撑起了一座桥,马可波罗回应说,一座桥的支撑不是因为某一个坚固的石头,而是因为一个拱桥是由许多石头构成的。”^[30]没有一个石头可以支撑起一座桥,许多的石头才可以。除了以上分析的一些重要的方面,还有一些如其他注本,像王弼、河上公本,虽流传时间更久,但其使用书面雅文,一般人士理解困难,故转而求之于浅显易懂的口义本;冈田正之在《日本汉文学史》中指出有关白居易文集在日本流行的原因,其中两点是白诗平易流畅和富有佛教教味。这可以从侧面辅助说明三子口义流行之故。当然,口义本自身注解的特色鲜明,对于三子的思想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更符合时人的需要,这是不言自明的。

“老庄道家思想虽然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而成为江户时期哲学的理论基础,但学者大多抱有一种为我所用的态度。”^[14]这大概是道家思想在江户时代流行,但并没有成为主流思想的一个原因。不只是学者,江户时期的复古神道了解道教、研究道教,也并不采纳道教^[14]。道家思想被儒释选择性吸收,但始终未取得主导地位,这也符合道家与世无争的哲学。林罗山一直在做一项工作,那就是试图在儒道两家之间做一个连接,探索如何让神道和儒学能够调和^[31],让三家思想共存融合并用。林罗山自己身居儒官,调和佛道两家的努力,正体现了日本江户时代儒释道三家思想激烈竞争的状态,释降儒升的更迭中,为道家思想争得了生存空间,以林希逸老列庄三子口义为代表的道家文献趁机而入,在江户时代大行其道,传播了当时中国先进的道家思想和治学方法,在日本掀起中国道家思想和文献传播的高潮,经过日本学人的受容消化,滋养推动了符合日本国情的新思想的诞生。

[参考文献]

- [1] [日]绪方惟精.日本汉文学史[M].3版.丁策,译.台北:正中书局印行,1980:131.
- [2] 张谷.道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49.
- [3] 陈小花.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41.
- [4] 刘韶军.日本现代老子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190.
- [5] [日]池田知久.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下)——以《庄子》为中心[M].王启发,曹峰,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686.
- [6] [日]武内义雄.日本における老庄学之三・林希逸口义の渡来と流行[M]//武内义雄全集:第6卷.东京:角川书店,1978.
- [7] 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Z].台北:正中书局,1975.
- [8] 日本庆应大学斯道文库.江户时代书林出版书籍目录集成[Z].东京:井上书房,1963.
- [9] 中根肃治.庆长以来诸家著述目录[Z].京都:八尾书店,1894.
- [10] [日]小柳司气太,小川贯道.汉学者传记及著述集览[Z].东京:名著刊行会,1970.
- [11] [日]岩波熊二郎.国书总目录[Z].东京:岩波书店,1969.
- [12] 周庆山.文献传播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86.
- [13] RICHARD BOWRING. In Search of the Way—Thought and Religion in Early-Modern Japan, 1582-1860[M].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67.
- [14] 孙亦平.东亚道教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5] 王晚霞.林希逸生卒年考[J].东南学术,2016(1): 233-239.
- [16] [清]饶安鼎,邵应龙修,林昂,李修卿撰.福建省福清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福清县志(内部发行)[M].1989.
- [17]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
- [18] [清]徐景熹修,鲁曾煜等纂.福州府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乾隆十九年刊本影印.1967.
- [19] [明]黄仲昭编修.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八闽通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 [20] 王迪.从书志考察日本的老庄研究状况——以镰仓、室町时代为主[J].汉学研究,2000(1).
- [21] 王晚霞.林希逸文献学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5.
- [22] [日]林道春.重刻老子庸斋口义序[M]//[宋]林希逸,[日]林道春批点.老子庸斋口义.日本庆长

- (1596—1615)年间木活字印本.
- [23] [日]渡边操.老子愚读[M].日本延享五年(1748)风月堂刊本.
- [24] [日]芳贺幸四郎.中世禅林の学問および文学に関する研究[M].日本学术振兴会,1956:190-214
- [25] PETER NOSCO. Confucianism And Tokugawa Culture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45.
- [26] [日]松波直弘.江戸期曹洞宗における三教一致思想—“曹洞護国辨”に関して[J].研究年報,2012(59):1-26.
- [27] [韩]김형석(Kim Hyeong-Seok).林希逸의老庄注를 중심으로 본三教觀(Lin Xiyi's perspective on relationship among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J]. 유교사상문화연구(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2006(4):223-253.
- [28] [日]荒木见悟.中国思想史の诸相・林希逸の立場[M].北京:中国书店,1989.
- [29]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 I 真理与方法[M].修订版.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30] DEREK THOMPSON.Hit Makers—The Science of Popularity in an Age of Distraction[M].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7:66.
- [31] RICHARD BOWRING. In Search of the Way—Thought and Religion in Early-Modern Japan, 1582-1860[M]. 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66.

The Taoistic Theory of the Edo Period in Japan with the Clue of Works

WANG Wan-xia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425199, China)

Abstract: The Neo-Confucianism spread to Japan at Kamakura, it becomes the official doctrine of the Edo period through Buddhist's study in Muromachi. Meanwhile, the Taoist turned into a tool of the Confucianism ascend. As a result of this, Lin Xiyi's work Laotzu Yanzhai Kouyi, Lietzy Yanzhai Kouyi, Chuangtzu Yanzhai Kouyi have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version of every kinds of the notepad to the Laotu, the Lieztzu and the Chuangtzu. The reason of the Taoist popularity first of all is the downfall of the Buddhism. Second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anism provided a good chance. Thirdly, the current of the three religions merged into one, which offered a condi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ome hermeneutics, psychology, mass-communication reasons. The scholars of Edo is condone and happy to choose something of Taoism they can use, but they do not believe Taoism truly. The Taoism did not have a reign in Japan, but it impetus the thought development in Edo period.

Key words: the Edo peroid in Japan; Taoistic; Laotzu; Chuangtzy; Lin Xiyi